

反對派欲癱瘓政府攪炒市民



立法會在3月25日因應疫情持續而取消大會，卻召開特別會議，議員戴着口罩開會，繼續審議涉及約2,158億元的臨時撥款決議案。反對派為求阻止撥款議案通過，可謂費盡心思，既有議員在上次會議中已提出中止待續議案，又多番點算法定人數試圖製造流

會，在3月24日更直接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要求取消會議。幸好他們的連番動作只屬徒勞，臨時撥款決議案最終獲得通過，否則政府服務就要停擺了！反對派議員企圖拉倒這臨時撥款，置民生於不顧，毫無道理可言。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正如財經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動議這項臨時撥款決議案時指出：「這是沿用已久的必要程序，具體安排亦與近年一致。」但我認為，以當前香港所面對的困境，這做法遠遠超出所謂「遵循慣例」的範圍，而具有特別的迫切性。大半年的社會動亂，加上近期疫情影響下，香港的很多中小企以至一般打工仔正陷於水深火熱的境地。

抗疫當前撥款急不容緩

臨時撥款決議案涵蓋的項目經費，涉及醫療衛生、社會福利、教育、保安等多方面的服務，還要支付合約員工的薪金和供應商的應付賬目等。以2020-21財政年度第一個星期為例，要給予醫院管理局約62億元的資助金，以及向約12萬個綜援受助家庭及約14萬名公共福利金受惠人士，發放合共約13億元，與社會民生以至當前抗疫都息息相關。現時不少人都關心醫管局轄下各醫院的前線醫護

人員，關注他們的抗疫及防護設施是否足夠，試問一旦因政府不獲批臨時撥款而令醫管局的服務受到嚴重影響，是否市民所願見，香港社會又可以承擔這惡果嗎？

此外，有反對派議員提出修訂議案，要削減臨時撥款總額，其效力是要將行政長官辦公室可支用的款項減為0。首先，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3條和第48條，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既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亦負責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其次，抗疫如同打仗，既要迅速就瞬息萬變的疫情提出應對措施，又要與香港境內外的其他政府機構加強協作，如果把行政長官辦公室可支用的款項削減為0，等於讓特區政府的中樞系統停止運作。

妖魔化警隊令市民吞苦果

反對派議員的另一項修訂議案提出要削減臨時撥款總額，其效力是要將香港警務處可支用的款項減

為0，益發令人慨歎。過去大半年一些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不斷升級，蔓延港九新界各區，暴力手段更趨激烈兇殘，堵路、刑毀、縱火、破壞鐵路與交通設施、襲警、濫用私刑，幾乎無日無之！這種暴力衝擊行為涉及嚴重罪行，警隊有必要嚴正執法。最近有一則令人髮指的新聞：警方在3月8日突擊搜查全港多個地點，拘捕17名男女，檢獲3個土製炸彈半製成品，以及2.6公噸製造炸彈的化學物料。這些搜獲的危險品並非放在荒郊野外，而是儲藏於鬧市之中。如非警方迅速破案，一旦爆炸品在製造過程中發生意外，或被投放於人群密集的大型活動中，勢必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同時，只要大家稍為關注香港抗疫新聞，必定留意到香港警隊除了肩負守護社會治安的職責外，還大力支持其他政府部門的抗疫工作，協助執行檢疫令，承擔了看守檢疫中心、聯絡正接受強制檢疫人士等繁重工作。反對派議員肆意妖魔化香港警隊，到底意欲何為？如果警隊因

缺乏資源無法有效運作甚至陷於停擺，哪些人會最得益、哪些人最終會蒙受損失呢？

由此可見，反對派議員的這些修訂議案既缺乏理據，更不符合公眾利益。何況，上述兩個部門的開支只佔整筆臨時撥款約3%，反對派議員卻試圖藉此全面反對臨時撥款議案，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同時，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六條，撥款議案需要整套去處理，歷來行之有效。正所謂圖窮匕見，從反對派的種種言行不難判斷，他們在議會竭力拉布，又以泛政治化的手段製造社會分化，無非試圖癱瘓政府並攪炒市民，最終讓全港市民吞食苦果。

當前，新冠疫情嚴峻，環球經濟前景亦不明朗。我們既要齊心抗疫，更要及時為民紓困，社會各界理應「反拉布、反攪炒、反泛政治化」！我亦希望各黨派議員秉持急市民所急、救民於水火的精神，在下個月盡快審議通過《2020年撥款條例草案》。

G20峰會習主席發言提振全球戰「疫」信心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G20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3月26日以視頻會議形式舉行，這次峰會是在全球疫情蔓延且來勢兇猛的情況下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發言提振全球戰「疫」信心，習主席指出當前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團結應對，全面加強國際合作，凝聚起戰勝疫情強大合力，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性疾病的鬥爭。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願同有關國家分享防控有益做法，開展藥物和疫苗聯合研發，並向出現疫情擴散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現在疫情的發展，出乎人們的意料。在這時候習主席的發言更具有一種很特別的含義，因為中國是戰勝疫情的第一道防線，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中，中國用舉國之力筑牢控制疫情蔓延的防線，實際上也給國際社會注入了信心。習近平主席發言時強調，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國際社會最需要的是堅定信心、齊心協力、團結應對，全面加強國際合作，凝聚起戰勝疫情強大合力，攜手贏得這場人類同重大傳染性疾病的鬥爭。中方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願同有關國家分享防控有益做法，開展藥物和疫苗聯合研發，並向出現疫情擴散的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作為新冠肺炎疫情首先爆發的國家，中國為防控疫情付出了巨大而艱辛的努力，終於

贏得了目前積極向好的形勢。中國的抗疫行動得到多國幫助支持，國際社會對中國提供的同情和支援，中國人民將銘記在心。中國人有一句古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中國已對83個國家以及世衛、非盟等組織提供緊急援助，包括檢測試劑、口罩等醫療物資，並向世界捐款2,000萬美元。中國對遭受疫情的國家感同身受，主動對有需要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

此次疫情發生以來，中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積極同世界各國開展抗疫經驗分享和交流。對於新型冠狀病毒這樣一個全新的未知病毒，中國對病原體進行了識別並向世界分享了有關資訊，使國際社會能夠對病毒得以及時了解和預防。面對疫情，中國迅速採取的加強檢測和隔離、封城、建立方艙醫院、學生停課等有效措施，也為各國應對疫情提供了重要借鑒。

習主席在講話裡對G20成員主要國家、主要經濟體，提出了具體的倡議。這個倡議涉及G20疫情防控資訊的共享、推廣全面有效

的防控指南，甚至要適時舉辦全球公共衛生高級別會議等等，這是今天的世界需要的。習主席強調，疫情對全球生產和需求造成全面衝擊，各國應該聯手加大宏觀政策對沖力度，防止世界經濟陷入衰退，要實施有力有效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加強金融監管協調，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疫情之下，全球經濟風聲鶴唳，中國經濟作為全球產業鏈條上的重要一環，不但在本國疫情最嚴重時保持了韌性，目前正逐步復工復產，經濟社會也加快重回正軌，從而在疫情向全球擴散時以最短時間向世界恢復輸送產品。這既保證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整，也給世界經濟穩定吃下了「定心丸」。

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指出，中國向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國家派遣醫療專家組，向眾多國家提供急需的醫療物資援助，分享在抗擊疫情和控制病毒傳播方面的經驗，令其他國家受益頗多。同時，中國穩步復工復產，提高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抗疫物資的產量，對打好這場疫情防控全球阻擊戰十分重要。



疫情惡化 更多企業需要支援

吳宏斌 博士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自從內地疫情受控後，不少港資廠商盼望特區政府能放寬往返內地後接受強制隔離檢疫的措施，讓他們可以有限度返回工廠處理緊急業務及作出應對危機的部署，後來聽說連疫情最嚴重的武漢也即將解封，大家對港府放寬政策的憧憬又大一點。誰知事與願違，輪到廣東突然收緊入境限制，所有境外人士包括港澳同胞，入境後均需要集中隔離14日。本港廠商能再踏足內地的日子又變得愈來愈遙矣！

疫情爆發，毫無疑問餐飲、旅遊、零售業首當其衝，內地設廠的港商其苦況亦不遑多讓，但卻往往被人忽視。而事實上，當疫情退卻，個別重災行業只要本地疫情穩定了便可以很快反彈恢復；但製造業肯定不是，復元之路將十分崎嶇。原以為內地復產後危機有望舒緩，但疫情卻在外地不斷升溫，全球30億人禁足，無人出街消費，除非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否則出口需求只會一直下跌，產品苦無出路，又要向供應商「找數」，更害怕被買家「拖數」、「走數」，面對流動資金愈來愈短缺的局面，卻連返公司救亡甚至收拾殘局的機會都沒有。進退兩難，說白一點只能坐以待斃。

支援企業遏止裁員潮

港府推出的300億抗疫防疫基金，只有某些行業得到應急支援，而同樣處於水深火熱的製造業卻不在其中。一直以來，如果廠商的製造基地並不設在香港，便被視為「境外工業」，甚少可以獲得港府的支援，更遑論現金資助；日前財政司司長在網上與商界討論財政預算案時，廠商會的代表便向他提問政府對珠三角廠商有何支援，結果財爺明言，除了可以向內地有關部門反映外，相信無其他實質的措施可以幫忙。雖然本來已沒有太大期望，但聽完有關回應後卻讓人更加沮喪。

其實我們這些境外工業與香港經濟的關係根本不能分割。製造業和息息相關的進出口貿易，在港差不多共聘用了60萬人，還未計物流及其他商業服務的供應者，他們通通也是這條產業鏈內的一員，彼此休戚與共。現在連進出口界也開始大聲疾呼求救，可見「火燒連環船」危機已進一步擴大。

各國近日紛紛大刀闊斧推出財政措施防疫和穩定經濟，例如英國將代替企業向受疫情影響而無法工作的勞工，支付最多八成薪金，讓企業不用解僱員工，愛爾蘭亦研究推出類似措施，而號稱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也包含幫助企業支付員工薪金的方案。

在疫情沒有遏止且正急遽惡化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實在有必要盡快推出更多救市措施，擴大支援的對象至所有流動資金短缺的中小企包括製造業，甚至不妨考慮借鏡其他國家幫助中小企業支付部分薪金的做法，這樣才能有效遏止裁員潮。

許楨 教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前文提及，英美經濟發展的資本化、虛擬化，有其自身的盲點，也有其得以憑借的獨特內、外條件。英、美的金融、貨幣和軍事霸權，使其具備其他國家和政治力量無法比擬的硬實力。尤其是美國在全球化過程當中，在環球管治體系具有的優勢，成為美元和英鎊強大購買力、保值能力的基礎。英美國家及國民，憑借自身發行貨幣，而換取全球貨物和服務的保障度高。這是由英美的環球影響力、戰略投射與威懾能力相關，而不純粹由其生產力、競爭力所決定。

相反，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恢復在世界貿易組織的席位以後，中國雖然積極參與全球化進程；然而，中國國家與國民在海外的網絡、影響力，以及得以掌握的實際戰略資源，仍然難與英美相提並論。在某些環節，甚或未如日本等近鄰。而人民幣國際化、中國企業和投資者走出去的道路，固然值得堅持下去，眼前卻遇上不少瓶頸尚待突破。可以說，在未來一二十年，中國企業和個人，在生產力、競爭力上的長足發展，能否合乎比例地轉化成對外影響力，暫時未容樂觀。

在上述宏觀背景之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重點，不單純著眼於民生生產總值、人均生產總值，以及財稅收入增加，就變得很理所當然地符合自身獨特情況和國際環境。除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理應作為GDP以外重要的衡量指標外；一些並不純粹以金額權衡的指標，如反映各式戰略物資和基建的產能、對核心生產與研發技術的掌握，就顯得尤為重要。簡言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平衡，各式各樣生產線、產業鏈的完整；比起人均生產總值的增幅、企業和產業的毛利、純利、邊際利潤，來得更為重要。

這一點的重要性，從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的應對手段與結果，就得以充分反映出來。疫情來襲之前，全球各式醫療口罩，大約有一半由中國內地生產。而與之相關的自動化生產線、ISO生產程度認定，以及不同原材料，來自中國內地的比例更遠超一半。當疫情首先在中國出現，其後各地各國相繼爭購防疫物資時，內地在保障供應、保障物流方面，自然具有明顯的優勢。

(疫情與中國經濟結構 三之二)

發債救經濟穩就業抗疫情

曾淵滄 博士



美國參議院以96票贊成，零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2萬億美元的追加財政開支預算，用以救助因新冠疫情而受到打擊的企業與個人，而香港卻有些議員對財政預算案拖拖拉拉，投反對票，香港人看在眼裡、記在心中。緊接着美國參議院通過2萬億美元追加預算之後，新加坡政府也推出一份追加預算，總額480億港元（約2,580億港元），計及較早時新加坡財政預算案的首輪64億港元的預算金額，兩輪措施合共550億港元（3,000億港元），整體財政赤字則高達392億港元（2,138億港元）。然後，是G20首腦開會，會上決定推出8萬億美元的救濟方案，全世界齊心合力救經濟，不救經濟，不病死也會餓死。

很肯定的是，香港特區政府於上個月財政

預算案的經濟挽救方案是遠遠不夠的，制定財政預算案時，香港確診人數依然不多。但是，隨著病毒在全世界大擴散，確診人數急增，全球斷絕了往來，外國封城比比皆是，全球經濟陷入絕境，香港失業人數將會直線上升。也許有人認為香港有良好的綜援制度，失業人士可以申請綜援。錯的，綜援只是針對最基層的窮人，一般中產一旦失業，是沒資格申請綜援的，他們可能還有一個自住的物業，每月要供樓，一旦因失業而無力供樓，銀行收樓可能會迫使這些人做傻事，2003年自殺的人不是社會上最窮的人，而是中產。

新加坡新一輪的救助方案，主要是保就業，新加坡政府的做法是直接接受疫情影響的企業老闆支付相當比率的僱員工資，甚至直接出手注資救這些企業，新加坡航空公司

就是被救助的企業之一。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國家、地區的航空業、旅遊業、飲食業都受到巨大的打擊，新加坡政府直接替這些行業的僱主支付50%至75%不等的員工薪酬，這應該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參考。

對美國而言，花再多錢也不是問題，可以無限量的印鈔票，量化寬鬆，香港特區政府不能印鈔票，只能動用儲備，儲備少了，有人會開始說「小心大鯉鯪擊港元」。因此，現階段也應該是特區政府思考大量發行政府債券的時機。過去許多年，特區政府認為自己有財政盈餘，沒有必要發債。不過，現在全球量化寬鬆，如果香港特區政府發行30年債券，相信利率依然很低，若等到庫房儲備少了才發行債券就遲了，那時候所付的利率會更高。

貫徹基本法擴展香港自貿網絡

許英明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是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法律保障。基本法頒布30年來，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區堅持依法辦事，在自貿協定網絡建設方面成效明顯。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2003年以來，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及系列補充協議。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來，香港依基本法，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簽訂了7份自由貿易協定。分別是與

新西蘭（2010年3月）、歐洲自由貿易聯盟（2011年6月）、智利（2012年9月）、澳門（2017年10月）、東盟（2017年11月）、格魯吉亞（2018年6月）、澳大利亞（2019年3月）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協定內容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政府採購、知識產權、經濟和技術合作、爭端解決機制等多個範疇。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不僅意味着關稅減讓（甚至零關稅），而且還意味着更大的投資便利和營商便利，更意味着香港「超級聯繫人」地位的鞏固和發揮。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支持香港、澳門依法以『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名義或者其他適當形式，對外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和參加有關國際組織，支持香港在亞投行運作中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澳門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加入亞投

行，支持絲路基金及相關金融機構在香港、澳門設立分支機構。」這裡的「依法」主要是依憲法和基本法，在可預見的未來，香港還會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簽署更多的自貿協定。尤其是在WTO面臨挑戰、原有的自由貿易秩序受到威脅、各個國家和地區正尋求通過雙邊和多邊自貿協定維護自由貿易秩序的背景下，香港自由貿易協定網絡的持續擴展，既顯示了香港積極參與全球化的意願和努力，也為香港深化發展迎來新的機遇。

香港貫徹落實基本法，自貿協定網絡已擴展至美洲、大洋洲、歐洲等地區。未來，需要構建高水準自貿網絡，特別是借助與內地簽訂的CEPA，發揮背靠祖國、面向全球的獨特優勢，形成自由貿易發展合力，推動香港進一步強化其作為國際超級聯繫人的角色，進一步鞏固其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